

周清玉女士

訪談紀錄



周清玉，一九四四年出生於台南小康家庭。台大社工系畢業後，隨即與姚嘉文結婚。基於個性使然，周清玉熱衷於社會服務工作，曾服務於台大醫院精神科、基督教社福團體等單位。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日發生高雄事件，姚嘉文成為美麗島大審被告之一，周清玉旋而多了政治受難者家屬的身分。本次採訪即以周清玉為主軸，瞭解她如何從一個本與政治毫無關連的社工專業人員，因丈夫的落難毅然踏入政治，企圖援救丈夫而投入選舉，及後成立受難者家庭關懷協會，並直接參與一九八六年催生民主進步黨的十人小組。透過本文，可以窺見在戒嚴時期，受政治迫害而遭受苦難的人並非僅止於擁有判決書的受難者，家屬，亦在關注的範疇之內。

出身台南小康之家 天生的社工性格

我是台南人，畢業自台南女中，之後就讀台大社工系，是第三屆的社工系學生。大學畢業之後，我便持續從事社會工作。在基督教婦女會待過，結婚生子之後，我認為應該要給孩子完整的照料，便決定擔任全職母親。但在做全職家管的時候，因為社工背景，我便抽空偷偷去做生命線的志工。後來更因為求學、工作等經歷貼近這個專業，很快的便開始負責比較重要的工作。從擔任自殺防治的生命線志工，到最後變成我主要負責訓練這些志工，甚至擔任志工協會的會長。一直到女兒四歲，開始上托兒所之後，我便重返職場。先去基督教家庭協談中心、家扶基金會（CCH），又去台大醫院精神科服務。我的女兒在一九六八年出生，所以大約是一九七二年，我正式重返職場。

之所以會去台大醫院，其實沒有特殊的原因，因為那是系上最好的選擇。在生命線擔任志工時，可能是因為表現不錯，所以被基督教單位聘為正式職員，當時主要的工作是負責家庭協談。也曾被派至家事法庭，協力處理家暴案件。這對我來說是刺激，也直接影響後來我持續從事家庭暴力防止，或是參與婦女中心的工作。加上我是基督教徒，所以這一切都覺得很自然。

我的家庭是很傳統的地方信仰，我會信仰基督教是因為讀台南女中時有幾位好朋友是信徒，她們會送我聖經，並邀請我參加教徒的聚會活動。當時，我並不是很瞭解教義，但因為我很喜歡唱歌，我是合唱團的學生，喜愛聖歌的melody（旋律），氣氛非常安詳，可能是這個部分吸引了我。其實，小時候媽媽也曾帶我上過教堂，但不是很常去，因為家裡畢竟是民間信仰。

台灣人的家庭幾乎都是父權的狀態，婦女都相當保守，有很多辛苦的地方。我有一個哥哥，一個姊姊，兩個都讀成功大學，家裡開「三虎」汽水工廠，所以經濟狀況還好。小時候我們都會跑進日式房屋，把家中的冬瓜糖拿一些出來分同伴吃，這是我童年最鮮明的記憶。我在學校當班長的時候，遇到有人沒有便當時，便會多帶幾個便當給同學。好像，從小我就是這樣的人。我們家裡當時也當棒球隊的主要贊助商，可見當時我們的生活不算很富裕，但還可以。只記得自己從小就會想關心別人，照顧他人，長大之後，學了社工便很投入。

我在高中時並未受洗，一直到姚嘉文入獄之後，我才受洗。因為基督教強調「信與不信的不要同負一軛」，所以我曾經找姚嘉文一起參加教會活動。但姚嘉文有他的想法，有他的邏輯，可以說比較沒有宗教的個性。他認為宗教普遍而言比較迷信，其實台灣的社會早期確實是比較迷信，但基督教比較起來不是那麼迷信。我倒是會在早上去買菜時，提著菜籃進教會，回家時再提著菜籃順道帶回家。在他入獄的時候，我曾經認為這是上帝要給他的考驗，因此並不是很擔心，心想，只要進去之後調查清楚便會發現他不是叛亂，很快就會放出來了。我當時確實是這麼想，約莫兩個月之後，我知道他在哪裡的時候，還把《聖經》送進去給他。

情治單位的精神折磨 不願屈服的改革理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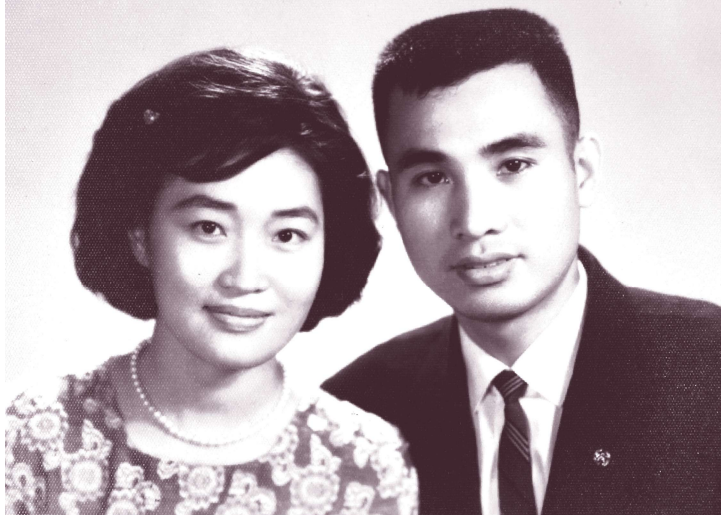
我最記得第一次面會時他的第一句話：「他們很會騙人，真的是騙得很厲害。」我問：「是怎麼了？」他說：「他們說你們已經跑走了。」關於這段對話，我印象很深。姚嘉文說調查局還騙他爸爸、家人都已經

放棄他了：「你就是一個大罪人，大惡人。你看，你所有的兄弟姊妹都沒有來看你，你爸爸沒有來看你，你太太沒有來看你，你的朋友都沒有來找你。」其實這是調查局他們製造姚嘉文被隔離的惡質手法，卻扭曲成是我們放棄了他，這是很嚴重的事，在精神上打擊了姚嘉文。

姚嘉文曾經去美國柏克萊大學接受Legal Aid貧民法律扶助訓練。為了孩子的照料，我與他分別在不同時間前往美國受訓，前後差距一到兩年。我去的地方是舊金山東北社區心理衛生中心（Northeast Community Mental Medical Center），那是一個在社區內的日常精神科診所。在那段期間，他們安排我去學校跟其他社會福利機構，九個月的課程結束後，美國的Asia Foundation提供補助，讓我們可以去美國各地相關的社福機構參訪，那當然對我有很大的動力、刺激。

我去美國的時候，美國州政府讓我們到各地方去看，抵達華盛頓時，美國國務院的人跟我說雜誌在我們家辦的怎樣怎樣，我聽不大懂，也不好意思沒禮貌的亂問。後來才知道，那是我不在台灣時，姚嘉文用我女兒的房間，提供給《台灣政論》當編輯部，有地毯、冷氣、書桌，整理得很好。當時，黨外資源都不充裕，姚嘉文當律師，所以比較能夠組織。在美國那一整年，看美國物產豐富、風景漂亮，民主、自由，什麼都有。回來之後，先生來接我，那時我很激動，心情有很多的變化。當時高速公路剛建設好，我在高速公路的回家路上，看到沿路風景，也覺得台灣很美，雖然沒有像美國那樣物產豐富，但這是我美麗的故鄉。所以在這之後，我變得很積極想推動台灣的進步改革。

回來之後，我一樣在台大精神科服務。與此同時，姚嘉文在做法律扶助的工作，他來自鄉下家庭，或許因為如此，他對於法律問題中的貧窮與沒有資源自我救助的人群與議題，特別關心。回來台灣之後，他協同



周清玉與姚嘉文的台灣大學畢業紀念照（上）與結婚照（下）。
（周清玉女士提供）

六、七位伙伴，創辦法律扶助的組織，就是現在「法律扶助基金會」的前身。

我們兩人雖差六歲，但是大學是同期畢業的。當時我們在大學內有一個「社會科學研討會」，由法學院五個系組成，每個系有幾個代表參加這個討論會，這幾位成員現在看起來都在社會上占有中堅角色。這個會的用意在於每個系把它的專業跟關注的主題

拿出來分享、討論，所以當時我們已經有跨學科的討論。我印象很深的是政治系與法律系都在討論戒嚴與憲法，像法律系說：「我們的憲法就像是一個孩子穿著不合身的大人衣褲。」這句話讓我印象特別深刻。

當時彭明敏被軟禁，姚是研討會會長，我是祕書，他找我一去看彭教授。但那一次，我不是很明白姚嘉文為什麼要去看他？儘管我算是跟去的，但感觸很深。當時我心想，去拜訪人家應該要買些水果，便去買了水果，後來，你們從彭明敏的書中讀到有人帶水果去探望他，那個人其實就是我。回想起那天的氣氛，其實是滿嚴重的，他家在溫州街那邊，前後左右、巷子口都站著人，這是我與調查局最早的接觸經驗。

備受呵護驕嬌女 丈夫被抓識現實

我讀大四時就訂婚了。當時我姊姊已經去美國，我就在考慮自己是不是也要出國？好像很自然，姊姊去哪我就去哪。姊姊讀台南女中，我就讀台南女中。像姊姊讀成大，我也自然而然想讀成大，其實會讀台大是被哥哥逼出來的。考大學時，爸爸已經過世了，讀成大的哥哥就說：「填志願卡哪裡都可以，就是不可以填成大。」因為我是老么，厝內厝外、鄰里工廠大家都很疼我，太嬌慣，像是霸王一樣。哥哥說最好把我丟到最遠的地方，讓我吃點苦，他當時還想，最好是去政大，因為那裡很偏僻，讓我可以成長。

先前說過，姚嘉文大我六歲，他比較成熟。其實我爸爸是開工廠的，當時的台灣社會，男性不只娶一個老婆的現象很多，我媽媽也吃了這個苦，所以對我媽媽來說，一個男人最重要的是會疼我、照顧我，其他都可以慢慢來。姚嘉文的母親生了十二個小孩，九個活下來，家裡有九個兄弟姊妹，經濟狀況其實不是很好。但是他對我跟我媽媽是盡可能的好。那時他白天上課，晚上在電信局上班，週末人家在郊遊、休息時，他還在上班。我媽媽認為他很打拚，肯努力、肯負責。

對姚嘉文來說，我一直是個孩子。他常說：「我開始唸書時，妳還在地上爬。」他對我媽媽真的很尊重，反正只要我放寒暑假，也許是在電信局上班的方便，他不時就打電話過來。我大三時想要跟姊姊一樣出國，他說如果我出國的話，大概兩人之間就斷了。因為這樣，我跟姚嘉文訂婚，也沒出國，直到孩子出生後才出國去受訓。

受訓回國後，我回到台大醫院工作，在精神科的工作對象基本上就是一般精神科疾病的病患。早期我在

基督教家庭協談中心遇到的個案多是疾病、貧窮、死亡、兒童安置家庭、婚姻暴力糾紛或者是外遇等問題。台大精神科是我當時實習一年的單位，所以當他們有職缺時，就邀請我回去台大服務。在台大精神科的工作範圍，我們面對家屬協助他們瞭解精神疾病的病情，對患者的照顧、態度與認知。除了對家屬的協談、支持、對病症的瞭解以外，甚至對住院的病人與日間護理（day care）和家庭關係都非常重要。這是醫院的治療，家族的治療，團隊的治療。所以精神科不只有醫師，還有社工與心理師，這些生命中的經歷跟我所受過的訓練，與我的職業有著極大的關係。

我時常覺得，一直都是我在服務他人，姚嘉文也是在做法律服務的工作，但是當姚嘉文被抓走時，我發現我其實什麼症狀都有：失眠、哭泣、焦慮……。好在我有受過這些訓練，可以幫助我瞭解自己，知道這個過程背後的意涵。我知道要怎麼面對這樣的困難、要怎樣積極的去面對，我的所學對我幫助很大。我也曾經消極地想過，要是自己不識字那該有多好，就不會遇到這樣的難題。

其實我們只是讀書人，我一直都是個乖乖牌，反觀姚嘉文，他是一個半工半讀的孩子，卻拿書卷獎，研究所也考第一名。所以在他的影響與課本的教育下，我的理解是，民主體制本來就應該要選舉，為什麼會與現實相違？我一直都相信課本，相信老師說的，但對照起現實社會卻不一樣。

被抓無關是否真正犯罪 政災波及小孩與工作

其實，起初事情發生時，我並不害怕，他們甚至連我在學開車考駕照時也在跟監，這真的很可笑，不知

道在跟什麼？一直到後來知道是準備抓姚嘉文，一方面是覺得可笑，一方面是可恨。在姚嘉文快被抓的前兩天，我緊張地問他：「跟蹤跟得那麼緊，不知道會不會抓人？」他反而說：「傻瓜，我們又沒做錯什麼事！為什麼會被抓？快睡！」我就乖乖去睡。因為我一直都沒有做什麼壞事，怎麼知道要害怕？我也一直相信我們在做的，是對的事情。

一直到姚嘉文被抓之後，我才知道他默默地為了蘇東啟的家人（蘇洪月嬌）和余登發等案件義務處理法律事務。¹重點是，在那個時代，不論你怎麼辯，輸的機會都很大，但姚嘉文還是義務協助他們，所以會有人稱他為「人權律師」。一直到姚嘉文被抓之後，我才瞭解到，原來這一切不是真的有反抗、叛亂的行為才會獲罪、才會被抓，也真的知道，這跟有沒有發生真正的罪行無關。

逮捕那一天是平常上班日的早晨，姚嘉文通常會先下樓熱車，我會帶著孩子鎖門再下去。等到我下樓時，人就不見了，樓下全都是國民黨的人。那地方就是現在的居住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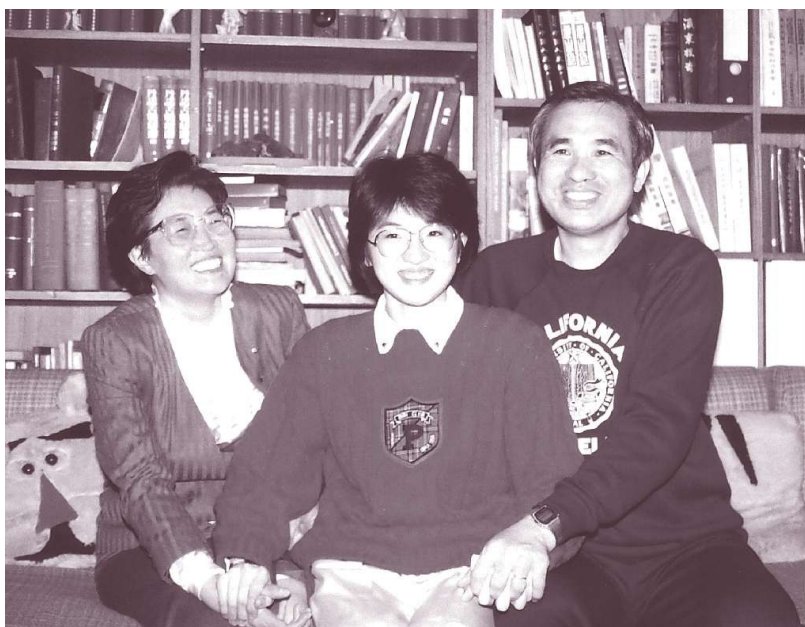
直到那時，我還不知道要害怕，為什麼我會覺得我們沒做什麼？因為姚嘉文騙別人騙不騙得了我不知道，但他是無法騙我的。那天是我們孩子在女師附小的段考日，我拜託這些人讓開，小孩子要考試，他們就是不讓，很過分，波及無辜的孩子，就是不讓小孩子去考試。姚嘉文被抓那年，孩子小學五年級，她還是每日朝會國歌的指揮，卻因為爸爸被抓的關係被撤換下來。孩子哭著問我，為什麼她不能夠當國歌的指揮？我覺得這對孩子傷害很大，很不公平。

我在台大精神科也遇到一些責難和困難，當我一週固定幾天在診間與病患、家屬面談時，都會有人來一旁監督，但那是一件私密的（confidential）醫療事情。到後來才知道，那是情治單位的人，監視我是否藉機向病

患、家屬做反政府宣傳，這真的給我帶來很大的困擾。當時我們在精神科的有兩位，一位是我，一位是林信男，就是林弘宣的哥哥。在我們之前還有一位前輩是林宗義²，他也主張台獨，但他們都很專業，很認真做事，沒有談那些政治的事。我在門診的診間內，怎麼可能會跟家屬談政治的事？那是掛號一個一個來的。

當時事情發生時，我們幾個太太像是黃信介的太太（黃張月卿）、藍美津³、許榮淑⁴都有聯絡。當時教會是很主動、積極的來關心我，那時我不知道牧師他們有介入這件事，但牧師、牧師娘都有帶我們一起祈禱，關心我們，他們帶給我很大的支持力量。

教會對我來說不是傳教者，而是給我一種疼惜的力量。其實對我來說，我的教會有民主的意識在內，反而當時沒有看到佛教



一九八七年姚嘉文出獄後的全家福照片。（周清玉女士提供）

1 此處指姚嘉文曾為蘇洪月嬌處理法律事務，而非直接替蘇東啟辯護。

2 林宗義，為台灣腦神經精神醫學奠基人。父親林茂生為二二八受難者。

3 藍美津（一九四一—），台北市人，曾任第五、六屆立法委員及多屆台北市議會議員，黃信介弟弟黃天福之妻。

4 許榮淑（一九三九—），屏東縣人，曾任四屆立法委員，現為「人民最大黨」主席（二〇〇九），一九七九年發生「美麗島事件」時，為張俊宏之妻。

的力量，長老教會有掌握到那個民主價值，他們也不害怕鎮壓，用很自然的態度來關心。

聯合眷屬找外援 呈現真相救丈夫

當時，報紙有寫美國要來台灣關心美麗島事件，順便探視我們家屬。因為我們沒有什麼特別的管道，但《台灣政論》是在我們家編的，跟康寧祥熟識，就找他協助聯繫美國人。他淡淡的對我說：「人家哪有時間可以見妳，他們也不認識妳。」他這樣講讓我很難過，含著淚水回家。以我的理解，這些報紙上說的海外力量，應該就是要來看、來幫助我們的。加上長期以來，康寧祥他們在辦《台灣政論》的時間，硬體設備都在我們家，姚嘉文也盡力提供他的法律知識。我不是想討人情，但現在我有困難，就算我們以前沒有幫忙到你，你現在也應該給我們協助。但他卻跟我說：「人家現在哪有時見妳……」讓我很難過。當時姚嘉文是涉案比較重的，我也沒有要他做些什麼，只希望可以幫我們聯繫一下。

我們幾個女生唯一的希望就只有這樣而已，回到家，我真的很不甘願。他們從美國遠道而來，我怎麼可以就這樣放棄？我就想辦法試試看，打一〇四查號台，問美國在台協會（AIT）電話幾號？想說死馬當活馬醫，結果在台協會一聽是我，就應允馬上接待，問我需要多少時間？有幾個人？誰要來？等等。我說：「我當然要去，但這不是只有我一個人的事，這是那麼多台灣人的事情，我可以把大家都集合來嗎？」美國在台協會答應了，所以我就把被捕的家屬都找來。我現在不大記得那是幾月的事了，因為我真的不敢記錄。當初，我曾因不時把所有行程與發生的事情記錄下來，而被康寧祥罵：「妳還敢記，他們就是這樣抓人，妳還

記！」意思是說，罪名就是根據他們手上那些筆記本的哪段話，便扭曲他們。這段往事我記得很清楚，所以我把很強烈的畫面、情景記住，但其他比較細節的都放掉了。當初我們的電話都被錄音，也不敢多說什麼。

後來我們去了AIT，他們給了我們家屬兩小時輪流發言陳情，並未給予我們任何承諾，當然我們也沒有要求他們得承諾、或付出什麼行動，我只希望如果美國真的關心，可以真的收到我們說的那些訊息，並給予我們幫助。我們一直蒐集相關訊息，把這些資料反映給外國媒體、AIT、國會議員等，只希望把真相呈現出去，沒有要求其他的什麼事情。

當時去AIT的除了我之外，有藍美津、呂秀蓮的姊姊（呂秀絨）、黃信介的太太（黃張月卿）、許榮淑等十八位。只要我聯絡得到的，我都盡力聯繫。其實在確定可以去AIT之前，我還是有去拜訪康寧祥。那種心情確實是滿矛盾的。我也請教他，是否有什麼要注意的？我覺得那個心情是……很複雜，我想我也還在那個情緒裡面。

帶出姚嘉文獄中手稿 做夾縫中的反抗

第一次面會是在景美看守所，第一句話就是前面說的「騙人」，我覺得很奇怪的是，姚嘉文怎麼會相信情報單位說的話？這真的很可怕，削弱人的心，我想他們就是製造疑慮。在他被抓之後，我才真正發現，人權這一方面是更大、更基本的問題，大多數人不大敢碰觸，除了我們這些遇上的人，大多數的人也不敢聲援。所以都要靠我們自力救濟，這些在檯面下，與政治關係最深、最苦的一塊，只能靠我們自己。這多少導

致我後來從政，是以處理社會問題的角度從政。

當時每週都可以面會一次，吃的、他需要的，我都盡量帶。起初內部管理很嚴，報紙都會剪洞，我們都稱為「洞洞報」。信件一週限制一封，字數也有限制，而且都要檢查。一直到後來管理才比較鬆。在面會第四到五次時，我見到林義雄，我還是有跟他說他家裡的事（指林宅血案）。起初，姚嘉文一次可以拿兩本書讀，後來只要經過檢查後，他就可以讀那些書，他開書單，我負責當書僮去找、去買。他也拜託洗衣的外役把寫的稿件帶出來給我，至於哪一本是第一本我忘了，可能是《紅豆劫》，拿到稿件之後我趕緊藏在家裡，情治單位倒是沒有來翻。先前姚嘉文被捕之後的搜查，他們在那翻東西時，我有跟他們說：「隨便你們翻，但是不要隨便放東西。」因為我聽說情治單位很可能會放東西栽贓。

代夫出征 從社工到從政之路

其實，我一開始本來想回彰化參選，彰化的鄉親跟我說要出來替姚嘉文選，我就是延續他、代表他的意志。我個人其實沒有什麼政治企圖野心，我的企圖就是把事情講清楚，不講清楚，別人都不知道，以為他是叛亂，其實他不是啊。但是他們有個條文，不讓我把戶籍遷過去，所以只好留在台北選，但我其實不是台北人，我在台北只是讀書、工作而已。為了這場選舉我去請教了高玉樹、吳三連兩位前輩，高玉樹告訴我他的黨外之路是怎麼走的，對於我這次決定參選，相信百姓會支持，他給我很大的鼓勵。有這兩位老人家給我牽成，我覺得沒有什麼好失去的（nothing to lose）。那一次聽說還是有被做票，做到不能做，我還是有十幾萬票。

一九八〇年那一次，我的選舉主題歌是〈望你早歸〉。一九七八年發生中壢事件時，姚嘉文正在宜蘭幫林義雄輔選，事件發生時就派我去中壢幫忙，等我去中壢時，范巽綠（張富忠⁵妻）他們這些年輕人也在那，我看年輕人很拚、很努力做事，便帶他們去吃飯。後來，他們出了《選舉萬歲》一書，聽說情治單位要去抄印刷廠，我們都跑去顧，從照片上還可以看到我女兒坐在那。

在這些斷斷續續的交會中，我跟這些年輕人逐漸熟稔。直至出事，再到我選舉時，他們都有來幫忙。當時黨外有「三林」：林濁水、林世煜、林正杰⁶，還有范巽綠、陳文茜、張富忠等人。

當時，因為選舉還需登記助選員，結果一開始沒有人幫我助選，我說，只要有一個敢幫我助選，我就



一九八〇年以姚嘉文妻子的身分第一次參選國大代表。（周清玉女士提供）

5 張富忠（一九五二—），桃園縣人，美麗島雜誌社編輯，涉「美麗島事件」，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日被捕，處有期徒刑四年。
6 林正杰（一九五二—），福建省漳州市人，一九八五年因質詢國民黨籍市議員胡益壽向市銀行違法超貸一億元事件，以「毀謗罪」判刑一年六個月。

去登記，就這樣子，蘇治芬成為我的助選員。我記得〈望你早歸〉就是蘇治芬的想法，她當時是紫藤廬茶藝館的老闆。當年選舉的聲勢是大家的情緒出口，當然，我自己也有情緒、也有感情，我的辦法就是把姚嘉文寫給我的信，讀給大家聽。這其實是給大家一個機會去知道，他不是唯一的一件政治案，有很多的人跟我們是相似的命運，這僅是一個小小的、簡單的出口。

從政不忘關懷人權 教會投入受難家庭扶助

選上國代之後，我想我去探視他多多少少有些優待。選舉期間民眾對我的熱情真的讓我很感動，一開始選舉時我們沒有什麼經費，可是時常在選舉場合內，一雙雙手握下來，大家都暗暗的把錢塞給我，那真的是很大的支持與溫暖。在這麼多鼓勵背後，我要承接的是更多的工作與任務。我心裡會想，這些錢是很大的幫助沒錯，但這十幾萬人的期許，其實是對社會的期待。



一九八一年為黨外三劍客助選。由左而右依序為：江鵬堅、周清玉、陳水扁、尤清、謝長廷、林正杰、康寧祥、黃天福。（周清玉女士提供）

於是我便著手設立關懷中心，出版《關懷》雜誌。

我開始去每一個法庭瞭解不認識的人、去監獄詢問、去送東西給他們、去他們家裡關懷。我們只有這一點點力量，始終無法全面性的照顧，這些與我一起努力的人大多是教會的人，像是長老教會的黃昭凱和施瑞雲。快過年時，我想到過年孩子一定要有紅包，就開始從那些找得到的家庭送紅包給孩子。我們關懷中心與原本不認識的政治犯和他們的家人就是這樣聯繫起來。甚至，等到他們出獄後，我們透過關懷中心的經費帶他們去作健康檢查。畢竟，在那樣的環境裡接受折磨，出來一定需要休養、照料。

從他們孩子身上，可以看到他們受的委屈。所以，我辦了幾屆的夏令營，讓孩子們去玩、嬉戲，讓他們互相支持，給他們一些溫暖、鼓勵。像是我的孩子，除了不能在升旗典禮指揮國歌之外，還曾在學校被同學丟石頭。老師的部分是還好，在中學時，老師很疼她，但是有同學排擠，這個現象也是存在。不過我從未聽孩子提



一九八一年周清玉創辦《關懷》雜誌，右為江鵬堅。（周清玉女士提供）

過有老師欺負她的事。

當時，海外僑胞還持續給我們經濟上的支援，我們便會把經費依序分給受難者的家庭。那都還是在戒嚴時期，所以我們是盡力去聯繫，但還是會有疏漏。像是陳深景⁸已過世的妻子，在陳深景被抓之後，不敢與我見面，這種情況都有，甚至有人給了支票卻還是不敢兌現。我們就是盡量做，中間難免有疏漏，我們確實也不敢太招搖的去查，總努力去做了，有做總比沒做好。

至於政治犯的名單，其實我根本不知道誰是誰，都是從報紙、公開資料去比對，用人際關係的牽線，再親自到土城看守所去找人。歷史上的確一直都有政治犯，但是我的接觸面是從我所知道的這些人開始，楊金海，有可能是我接觸到的政治犯中最早期的一位。

在台大精神科的林信男和我曾經在家人被抓的初期，不知道當時那種情況的嚴重性與可怕，天真地想



一九八六年民進黨創黨十人小組增為十八人工作小組，前排左起顏錦福、周清玉、謝長廷、費希平、黃爾璇、康寧祥、許榮淑、張俊雄、傅正；後排左起邱義仁、洪奇昌、江鵬堅、尤清、周滄淵、蘇貞昌、游錫堃、陳菊。（周清玉女士提供）

說可以把這段過程、情景做一個學術研究，但實在太傷、太痛，不忍心做。林弘宣原來是教會的人，原本就有自己的路線，他太太（林黎瑋）當時已經是議員，被扣上八大寇的名稱，他有熱情、又熱心服務，但是他不是一個社會上知名的人，其他被捕的人不是律師就是其他具社會名望的如省議員等，所以據我所知，林弘宣回到社會之後可能不是很順利。

解嚴前的集結 民主進步黨創黨

當選國代之後，我自知對憲政學識不足，像是傅正老師、李鴻禧老師都給我很大的指導、幫助，我每週都去李鴻禧家讀書，唸憲法。因此，我才可以推動國會改選等改革運動。

組黨是一直有在討論的事，如果要說從什麼時候開始，我也不知道該從哪一年說起，像「美麗島」就是沒有黨名的黨，如果這是一個大家有共識的事情，一定會持續努力，不會放棄。我們的組黨成員確實是在一連串的誠信保密篩選中確定，不過我不是最初提議要創黨的成員，像謝長廷是十人小組的成員之一，在這些成員中，我們彼此認定不會洩漏機密。前面提到那些年輕人已經組成一個「編聯會」，我們這邊是年紀比較大的從

8 陳深景（一九四二—），屏東縣人，李棠華技術團樂師，涉「陳深景台獨聯盟案」，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十二日以「意圖以非法之方法顛覆政府而著手實行」罪名，處無期徒刑，蔣介石去世，根據「中華民國六十四年罪犯減刑條例」減處有期徒刑十五年，一九八六年十月卅日出版。

9 楊金海（一九三二—），高雄縣人，海聲貿易公司董事長，涉「楊金海、顏明聖計畫叛亂案」，一九七六年七月廿七日以「意圖以非法之方法顛覆政府而著手實行」罪名，處無期徒刑。

政者，靠近「公政會」。

創黨前有特務跟蹤我，但我從未與他們打交道。最好笑的是，我家樓下都會站人，有一次我回家，在樓下還被他們問：「妳要找誰？」連我都不認識不知道在跟什麼監？這一路上，我真的是很氣，他們也是很認真。有一次，我去高雄參加余登發的葬禮，那個送葬隊伍裡我們的車一台跟著一台，結果我們每一台車後面都跟著一台監視的車，搞得車陣好長好長。這真的是可笑又可惡，他們也不怕你知道，就公開這樣跟監。

我們一直認為最危險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所以，按照習慣，創黨小組時常在我家聚會。說一件事就可以證明：我們家樓下有一個洗車工不時在那洗車。結果，在組黨宣布之後，洗車的先生跟我說：「吼，原來就是要組黨。我想說怎麼會一下看到謝長廷，一下看到費希平。」這足以顯示我家平常就是有這些人在走動，沒有什麼好奇怪的。



一九八七年推動國會全面改選，於總統府前靜坐抗議。
下排中央坐者為周清玉。（周清玉女士提供）

要組黨，就是來我家討論，到現在那個討論的桌子我都還留著，每次黨慶都有人建議要借展。

其實國民黨都有監聽，甚至，我們還會在討論過程中說：「你錄音的聲音我們都聽到了。」但我要聲明一件事，我們面對家人、朋友都是隻字不提，像我女兒都不知道。

我們在通訊系統中，像是電話都不談這件事。至於會找費希平，那是因為傅正的關係，同時，我們理解他對中國大陸的原鄉情感，但由於我們也與他在解除戒嚴、國會改選等民主理念契合，所以我們會一起創黨。儘管，我們瞭解這中間有統派、獨派，但在這個推動民主的階段，我們認為力量必須要相加在一起的。

周清玉女士訪談紀錄

時間：二〇一〇年十一月四日

地點：台灣國家婦女館

訪問：許文堂

錄影：詹亞訓、蕭伶仔

記錄：蕭伶仔 校對：詹亞訓